

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而没有看到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需要,那么,中国的语文教学就会一成不变,中国的文化就失去了活力。

当然,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者应当尽可能地选择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文章,从而丰富学生的思想。过去鲁迅先生的文章一统天下,现在,适当减少鲁迅先生的文章,补充其他体现当代文学水平的文章,不仅有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解中国的文化内涵,而且有利于丰富人们的逻辑表达体系。

部分学者之所以感到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害怕鲁迅精神的离去。在互联网写作时代,的确有一部分人精神颓废,他们把鲁迅先生的批评精神作为自己不负责任的挡箭牌,把鲁迅先生的爱恨情仇异化为自己放荡不羁的借口。这种高举鲁迅先生却公开羞辱鲁迅先生的做法,应当遭到人们的强烈鄙夷。部分年轻人怀念鲁迅,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鲁迅精神,他们只不过是借酒发疯,把鲁迅先生的文章作为遮羞布,继续在互联网上胡言乱语。

重新评价鲁迅先生是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的事情,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学生正确使用汉语的方法,通过学习范文了解我国汉语的历史成就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适当删除鲁迅先生的文章,让学生更加专注于表达方式本身,或许有助于减轻中学生的学习负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汉语表达的基本技巧。

当然,作为一个背诵鲁迅先生文章长大的学者,笔者对鲁迅先生怀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先生的一些语文表达方法,不可避免地影响笔者。这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成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心比心,笔者也希望先生的文章随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然而,中学语文课本的承载量毕竟有限,所以,我们建议在中学语文课本之外,大量出版鲁迅先生的作品,作为中学生的课外读物,增加他们的阅读量,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思想。

这场风波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多元化社会千万不可强求一律。假如只看到鲁迅先生思想深刻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现代化社会表达方式的多样化,那么,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会各执一端。过去,我国中学语文采用统一编写教材的做法,现在看来,如果允许不同的组织、不同机构分别编写教科书,那么,有些争论或许就可以避免。当然,这其中涉及到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涉及到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充分意识到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科学地组织教学内容,那么,就一定能够提高中国的语文教学水平。

文化时评

恢复语文的本来面目

乔新生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省市中学课本中删除了鲁迅先生的部分文章,耳熟能详的《纪念刘和珍君》、《阿Q正传》、《祝福》、《药》被其他学者的文章所取代。学术界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将会失去鲁迅精神,破坏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中学语文教学首先是一个表达方式的教学,中学语文在注重思想内涵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表达方式,让学生掌握现代语文的基本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减少鲁迅先生的文章,不是淡化传统价值教育,而是更加重视现代语文修辞表达方式的教育。众所周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鲁迅先生的文章在表达方式上有一系列的创新,但是,正如鲁迅先生同时代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曾经留学日本的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遣词造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这种具有异域风情的表达方式,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汉语表达可以更简洁、更通俗。

鲁迅先生开辟了白话文的历史,但是,中国的语文教学不能只停留在白话文的初级阶段,而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在选择语文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深邃的思想,又要考虑到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将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从语文教科书中删除下来,增加当代语文的比重,这是中国语文发展的需要,更是现代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体系,中华民族也是如此。中学语文的选择,既是一种文化的继承,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创新。如果只看到中国文化发展某一个

今年年初以来,陆续读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董开军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学部委员为祝贺王家福教授80大寿而写的文章,感到十分亲切,也忍不住回忆起自己与王家福老师打交道的一些片段。

我于1993年4月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那时王老师是所长。到所不久,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的导师曹子丹教授与他是留苏同学,就我来所一事给他写过信,然后说了些鼓励的话,包括要学好外语,以便所里要派年轻人出国时自己的外语不拖后腿。那次见面时间很短,感觉他很忙,但对于一个刚到所里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难忘。2009年,曹子丹老师80大寿时,曾搞过一个小规模的祝福会,我和王家福老师都参加了这个活动。家福老师深情回忆了他与曹老师留学苏联的经历,其中特别提到有一段时间他失眠严重,于是曹老师陪他出去玩了几天,结果回来后失眠也好了。

接下来在所里的一次会上,王老师把我和另一位同年进所的民法系的青年学者一起向与会者作了介绍。那次会议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王老师提到自己作为所长,与老所长张友渔比起来,对国家决策的影响要小很多。几年后,当王老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两次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讲法制课,还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特别是为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作出巨大贡献时,我常常想起王老师的这次讲话,有一种“形势比人强”的感觉。

那时,我们几个年轻人住在法学所院子西小楼,所里专门请了一个厨师为我们几个人做饭。记得有一次,我在宿舍窗户朝外望时,正看到王老师在院子里向几位外宾介绍所里的建筑。他们边谈边走,当走到我的窗户外面时,只听见王老师问旁边一位法学所的行政后勤负责人:那几个小孩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当他从对方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后,放心地点了点头。我当时感

法界前辈 人生导师

——恭贺王家福教授80大寿

刘仁文



到一股暖流流过,赶忙悄悄地从窗户外边走开。

后来在法学所的各种会议上,经常能听到王老师的讲话。记得有一次他讲到在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报告时,向中央领导同志解释用“法治”比“法制”好,后来他的这一建议被江泽民同志采纳。会后正好有一家杂志向我约稿,于是我就以他介绍的这个内幕为引子,写了一篇《一字之改,意义重大——从江总书记改“法制”为“法治”谈起》。文章发表后,被《文摘报》等多家报纸转载。事后,我还送给王老师一份报纸。还有一次,他讲到学术研究要独立思考,有所创新,引用张友渔老所长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不准抄书,就是抄毛主席的书也不给稿费。”

王家福老师没有官架子,总是给人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那时司机班在我们西小楼有一个休息室,我们常去他们那里看电视,久而久之,与几位司机师傅也熟了。他们会经常跟我们讲一些王老师的逸闻趣事,比如有一次,所里晚上要宴请外宾,司机如约到人民大会堂门口去接他,但久等不见,于是只好进去找他,却发现他正在那里准备吃盒饭,遂问:您是否忘了今晚请外宾的事?他陡然记起,连忙拿起脱下的西服和领带,边走边系,结果情急之中把扣子系到了错误的扣眼里……当他们善意而逼真地模仿王老师的动作时,我相信他们其实是在夸赞王老师的宽厚仁慈。

我平生最易对厚道的人产生好感,所以对王老师这样有大名、居高位却不摆架子的长者敬仰之情日增乃情理之中。一次,在北京饭店会议用餐时(自助餐),我正好排在他的后面,遂鼓起勇气对他说:“王老师,您在咱们年轻人眼中,真的是德高望重。”他赶忙客气地说“哪里哪里”。而我,此话说出口后,也感觉松了口气,因为终于把要表达的意思当面表达出来了。

王老师的专业是民商法,他曾担任全国民法学会的会长,对他在这个领域里到底有多深的造诣,我因隔行如隔山,一直有点好奇。某日,在梁慧星老师的一本书中,发现他提到自己的导师王家福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如何得民法风气之先的,遂找梁老师求证。梁肯定地说,在当时,家福老师的思想是民法学界最开明者之一。这次细读梁慧星老师为祝贺王家福老师80大寿而写的文章,进一步了解了有些事情的内幕和细节,始知王老师当年在社科院法学所民法系主任这个位置上为推动民法学科的发展、推动《民法通则》的颁布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王老师为人低调。有好几次场合,他和另外几位老师一起参加活动,大家都希望他能讲几句话,但他总是委婉谢绝,让别的老师上去讲。但他又很热情。今年春节,我给师友们群发了一则恭贺新春的短信,没想到很快收到王老师的回信:“祝仁文全家新春愉快!”这成为我整个春节期间收到的最惊喜和最珍贵的短信之一。

王老师的言行总是与人为善,他多次强调人要有感恩之心、报答之情。同样一件事,别人可能会有所怨言,在那里那里充满善意,如上个世纪80年代

初,围绕民法和经济法的地位问题曾产生过一场论战,我看到过有的学者回忆这场论战的文字,至今意难平,但作为当时这场论战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家福老师却说,那种友好、平等、理性的交流和探索,增进了学者间的合作与团结。

虽然王老师的口才不是那种演说家的口才,但他的每次发言我还是很爱听,因为他的发言有内容、有思想,又很真诚,而且一般比较简短。记得2002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时,王老师作为校友代表发言(他1952年随北大法律系合并到北京政法学院,参与了后者的建校工作),我当时还有点替他担心,因为在他之前发言的是教师代表江平老师。江老师的演讲是法学界有名的,自然效果没得说。但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天王老师的发言也很有激情和文采,我虽然没有听江老师发言时的那种激动,却不知不觉间被他感动得眼角湿润。

说到王家福和江平这两位当代著名的法学家,我还感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2005年前后,法学所聘江平教授担任荣誉研究员。在仪式的最后,家福老师应邀致辞,他说,江平教授才华出众,精力过人,道德文章皆为人们敬佩,我们要特别学习他的以下三颗心:一是报效祖国的坚贞的心,二是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勇敢的心,三是充满爱的仁爱的心。妮妮道来中,深感王老师对江老师的了解和友谊非同一般。而江先生也动情地回忆起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他还任延庆一所中学教书时,王老师先后数次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往返于城里和延庆,想把他调到法学所来,后来因为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他要回那边去才没有来成法

学所,不过对王老师的感激之情却永生难忘。

王家福老师是一个人世的人,但又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有一次,一家律师事务所想通过我邀请他参加一个疑难案件的专家论证,我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他说可以。但后来开会的时间与他的行程冲突,他参加不了。邀请方想事后请他补签个名,王老师不会不知道那是有报酬的。但他拒绝了,理由是自己没看材料,没参与讨论。

从所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家福老师仍然担任着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和法学所的终身研究员。他的研究生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他的出席和致辞似乎已成为法学所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成为我隐约期盼着的一次学习的机会。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毕业典礼上,王老师再次语重心长地叮嘱那些即将走上社会的莘莘学子,要襟怀远大,既要有团队精神,又不能在原则面前退让。

十多年来,我个人的成长也得益于王家福老师的多次鼓励。记得有一次,李步云老师组织一个公法中心的会,轮到我说发言时,李老师介绍说,这是一位目前在国内比较活跃的青年教师。此时,王老师插了句话:不只是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很活跃。还有一次,法学所聘任大会述职,我按要求汇报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事后在院子里遇到王老师,他说:听了你的述职,很感动,那么多成果!寥寥数语,尽显一个法学家对晚辈的关心。

如今的家福老师,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但依旧忙碌和活跃在社会上、书斋里。去年底,他荣膺全国十大法治人物,对他的颁奖词中提到:“他用50年时间做了两件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这当然是把王老师的丰富人生作了高度浓缩,不过,这两件事确实带有标签性。毫无疑问,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历史不会忘记王家福这个名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

“百团大战”咋成了娱乐栏目

梁德荣

很多细心的观众发现,去年才推出的李咏主持的《咏乐汇》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档竞技类节目《百团大战》。如此栏目名称,当即受到众多观众的质疑。

换上一身银色抢眼服装的李咏,其主持的这档节目到底好不好看,笔者无意在这篇短文中讨论。但他拿“百团大战”来做这个娱乐节目的名称,可说是十分不合适,引起观众的不满也是理所当然的。

将“百团大战”用做娱乐栏目名称,首先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八路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参战部队达105个团,因而称此为“百团大战”。这个有关抗日历史的专用名词,体现着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顽强作风和精神,以及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伟大英雄气概。一旦变成娱乐节目的名称,必然会消解“百团大战”原来具有的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易使后人历史产生误解,产生不良的负面影响。百团大战是抗战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壮烈历史,这个名词如果被移植用于各种各样的用途,会在潜移默化中转移它的特定内涵,产生出种种歧义。长此下去,必然会导致许多人对百团大战理解上的异样。对历史有较深研究的还好说,但很多不太懂历史或者还没学历史的人,就会受到影响。正如一位网友担忧地认为,“以后我对儿子讲百团大战时,他可能会兴奋地告诉我‘我知道百团大战,是李咏哥哥主持的节目。我看电视就懂了。’”如此景况,历史将何以堪?人们又将何以应对?

总之,“百团大战”用做电视娱乐栏目名称,是极不妥当的。是对严肃历史的嘲弄和玩笑,也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不管这个节目办得受不受观众欢迎,也不应该再用这个名字。让“百团大战”回归它历史名词的地位,央视当重视和做好这个事情。



雏菊(国画)

潘晋华作

“笨贼一箩筐”与读者见面

一个行窃之前还想着先与被窃者交换名片的窃贼,一定是个笨贼;一个行窃之前还想向被窃者炫耀一下自己小提琴技艺的窃贼,一定是个笨贼……当一高一矮两个头戴蛛丝的“笨贼”搭梯屡屡行窃而终不得逞,秉持“贼笨则天下太平”创作理念的台湾漫画“顽童”萧言中,持续在大陆各媒体“行窃”五年之久,以近千幅“笨贼一箩筐”系列单幅漫画创造了华人世界单幅漫画的奇迹。近日,由磨铁图书推出的“笨贼一箩筐”系列之一《偷天陷阱》、之二《天下乌贼》、之三《忙里偷钱》、之四《津津乐盗》、之五《趁热打劫》全面上市。

萧言中,台湾地区漫画四大才子之一,从1985年创作至今,出版了30余部漫画,《童年短路》更创下50万本销售纪录。编、导、演了20余出舞台剧,主持电视节目“超级旅行家”、“漫话漫画”……享有“最不务正业的漫画家”之美誉。

在萧言中无心插柳的“笨贼一箩筐”系列中,他利用单幅漫画的空间感开发笑点、奇想,也开发人性。虽然“笨贼”从未成功地完成过一次任务,但这些笨贼“愚蠢可笑”的行为却让萧言中画出了感情。

(本报记者 彭诚)

张炜《你在高原》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9月4日,作家张炜《你在高原》作品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主持会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等领导,张炯、雷达等20多位著名文学评论家与会。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古船》、《九月寓言》到新世纪的《外省书》、《刺猬歌》,张炜的长篇小说创作可谓成绩斐然,此次《你在高原》的问世,更是张炜历时22年呕心沥血、几经打磨后的收获。《你在高原》包括《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10部39卷,共450万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为了圆创作一部史诗之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张炜便划定区域考察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开始向“高原”的行走。小说以一名地质工作者为主人公,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心灵史,浓墨重彩地追溯了百年中国的转型历史。

铁凝谈到,这部作品不仅让张炜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也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收获。作品对于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对于道德良心的追问、对于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讨、对于自然生态平衡揪心的关注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积极达观的精神立场和充满诗性的情感表达,构成了《你在高原》的思想基调,呈现出超拔脱俗的品貌。就艺术而言,这部作品中错综复杂的历史、宏大的故事背景和众多的人物,展现了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一地域的面貌,而在具体的细节刻画和人物摹写上又细致入微,生动感人。

(本报见习记者 刘洋)



数年前,我托一个报社的朋友转稿子给另一个报社的王国华先生。稿子发了,但却不认识和了解他。前些日子托一个期刊的朋友又转稿子给国华先生,朋友说,哎呀,人家很熟悉你的,你们直接联系吧。这样,我们就靠着现代的网络直接联系上了。第一句话,他就说:“武林兄,我在《春拳报》上拜读过你的诗歌。”一股暖流一下子从二十多年前的岁月里潺潺而来。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职业中学写诗的美好时光。

我知道国华先生和我一样,也是码字的人,兴许,偶尔读过他的作品但不曾留意。所以,我想索要他一本书,系统地了解一下他这个人。他说,我出的那几本书,不算书;但有一本,是我比较满意的,不过,这本书是自费书。我很诧异。作为码字人,我很清楚,不是作家协会会员的,死活都想弄一张会员证;没出过书的人,死活都想出一本书。这是文人墨客的一种顽症,根本没有治愈的良药。而他,远非这样的人啊。因为在出版社工作,所以对自费书我一半是排斥一半是理解。起初是这样

越读越欢喜

安武林

的,后来认识转变了,觉得惠特曼这样的人如果不自费出书,恐怕到死都未必能出一本书。他是何种情况,不得而知,一点疑惑像书一样夹在我的脑海里了。

很快,他的书到了:《越读越悲伤》。书的封面很素雅,灰白绿三色构成,32开,五分二的空间是荷叶荷花图。作者名是:易水寒。最下面写着:易水寒书话系列之一。他公开出版了七本书,这本自费书应该是他的第八本。带着好奇,迫不及待地读了几篇。谁知,一读就丢不下手了,花了一天半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我马上把第一感觉告诉了他:“我也想出一种顽症,根本没有治愈的良药。而他,远非这样的人啊。因为在出版社工作,所以对自费书我一半是排斥一半是理解。起初是这样

的神圣。”他钟爱这本书的理由的密码,全在这句话里。仅此一句,我便在精神和心灵上与他亲近了很多,似乎老有多年未见此刻重逢一样。

严格来说,他书中的文字当为书人书事的随笔。如果按照三联出版的《叶灵凤随笔》那样划分的话,他书中文字当归为读书随笔类。其实,叫书话或者读书随笔都无所谓,就像我们把自己养的宠物起个人名一样。他的文字中有一股浓浓的酒味,而且是高度的白酒味道。若非这样,酣畅淋漓这个成语便不能馈赠给他。这个冷眼观世,外冷内热,倒有一副侠客的热烈。豪气、侠气十足。就像毛志成当年给伍立杨写的文字“令人嫉妒的年轻”中所说的一样,缺少了点曲折圆通之术,这是

常人的眼光,在我看来,这恰是他性情使然,坦率所至。文章棱角分明,随心所欲,一个活灵活现的人也呼之欲出了。

文中的第一章是“文人素描”。文字简洁,自然,一个意思说完就完了,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一看就是那种在报刊上投稿滚爬摸打、有着丰富而又沧桑经历的人。这章的文字,多为文史钩沉一类。他的随笔多有杂文之风。冷嘲热讽,犹如高明的护士打针一样,你还没感觉到痛,这针已经打完了。给人惊喜和回味。第二章是“学人对谈”,我熟悉的是伍立杨,但伍读书比较谨慎比较谨慎,他虽然是我多年好友,但我不敢和他谈古论今,我熟悉的还是伍立杨,就像在读着自己。我读着他和我在同一个城市,我一定给他打电话:“国华兄,我请你喝酒去,但你买单,谁让你消耗了我一天半时间来着?”